

AI时代券业人才的机与危

“金融科技的纪元已经来临。我们以AI(人工智能)为翼,飞向价值的更高维度。我们以Code(代码)为基,重塑底层秩序。我们以Quant(量化)为舟,穿越市场的不确定性。”广发证券2027届Fintech(金融科技)校园招聘的宣传语,映射出了当前券业对AI人才的强烈渴望。

AI时代的到来也为具备相应技能的人才提供了新机遇。北京商报记者关注到,多家大型券商已在年内针对AI人才开启专场招聘,更有机构通过以赛选才,并给出无实习考察环节、直通终面等优待条件。有券商从业人士坦言,使用AI已经可以达到“1个人+AI>2个人”的效果。可以看出,AI时代下,既创造了需求,又加剧了竞争。那么,哪些人会获得机遇?又有哪些人可能被淘汰?

专场招聘抢人才

在AI广泛应用的当下,开设金融科技招聘专场在券商行业已不罕见。北京商报记者据公开信息梳理,截至9月17日,已有包括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平安证券、国金证券在内的多家券商启动2027届秋季校园招聘。

例如,中信证券在8月全面启动2027届校园招聘,招聘信息显示,“人工智能”岗位列在一级大类,与投资银行、固定收益、资产管理等业务方向同级别。由此,行业“一号”对AI人才的求贤若渴可见一斑。

值得关注的是,华泰证券、广发证券、国泰海通证券等机构还在年内针对金融科技/AI人才开设专场招聘。8月,国泰海通证券开启了金融科技条线2027届校园招聘,招聘岗位包括算法与模型研发工程师、数据平台研发工程师、AI算法工程师(运维方向)。

华泰证券在今年上半年也开设了“Fintech专场”,聚焦Fintech科技人才招聘,职位类型包括AI、算法、软件开发、数据、测试、产品等。值得一提的是,该“Fintech专场”无实习考察环节,面试通过即可直通Offer。

技能门槛方面,部分岗位要求熟练掌握Java、C++、C#、Python等主流编程语言中的

一门,掌握大模型技术原理和基础模型架构。另外,有知识库、Agent(智能体)、LangChain(基于大型语言模型的编程框架)等技术经验的优先。

国金证券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AI时代,我们对AI人才的需求正从‘单一技术能力’转向‘AI能力+业务理解+安全可控+工程落地’的复合能力。大模型应用需要既懂金融业务(投研、投顾、合规、风控),又懂AI技术(算法、数据工程)的复合型人才”。

从加分项到必备项

AI时代的到来为具备相应技能的人才提供了新机遇,更有机构为吸引优秀人才,有针对性地举办相关挑战赛,对专项人才进行储备。早在今年4月,华泰证券就启动“2026Fintech星战营——AI专项人才储备计划”。该挑战营2026年项目聚焦“AI主题”,围绕金融垂类大模型领域的业务实际问题开展课题实践。通过课题答辩的人才,还可以直通校招终面,表现优异者更有机会超前斩获录用Offer。

据悉,华泰证券早在2009年就率先启动互联网战略、2019年启动全面数字化转型、2023年启动大模型能力建设、2024年完成大模型体系构建,并在2025年确立“All in AI”

战略,更喊出了“让整个华泰成为一个科技驱动、拥有专业金融智慧和超级服务能力的‘人’”的口号。

今年6月,广发证券也启动了“AI & Code & Quant挑战赛暨2027届Fintech校园招聘”。据悉,该项目也是广发证券“以赛选才”的战略级招聘项目,涵盖AI、Code、Quant三大赛道,意在寻找算法极客、编程工匠及模型捕手等。

相关内容也指出,上述比赛是参与者敲开公司核心岗位的“黄金入场券”,挑战赛与校招直接关联,在比赛中表现优异者将直通校招录用Offer,参赛即意味着已踏上校招“直通车”。

从测试开发、策略指数研究到量化交易,AI逐步从“加分项”过渡成“必备项”。通常而言,AI人员主要受聘于信息技术部或科技研发部,但从各家券商当前招聘的岗位可以看出,AI技术已经渗透多方面业务。

前述广发证券相关项目的招聘岗位也不仅限于AI算法工程师、AI产品经理、测试开发等技术岗位,更涵盖FICC(泛固收)业务、金融产品研究、资产管理业务、股权衍生品业务的多个岗位,如量化交易、海内外金融产品等各类产品研究、策略指数研究等。

某头部券商的金融科技人才小志(化名)也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现在我所在的部门

很看重AI的应用,公司内部也大力提倡用AI提效。对于业务部门而言,懂AI更是加分项。在AI时代,懂AI的人才,机会无疑也会更多”。

AI浪潮下不进则退

不过,当券商以专场招聘、直通Offer抢夺AI人才时,另一群从业者的职业危机也在同步逼近——功能基础且内容重复度高的岗位。在业内人士看来,那些边界清晰、流程明确的重复性基础工作,恰恰是大模型最先“学会”的部分。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认为,AI替代人工的分界线在于工作的可编码程度。例如,初级分析师的财报提取、数据比对、PPT搭建,本质是边界清晰的流程化任务,最易被Agent替代。而资深分析师对关键数据来源的判断、机构销售对客户信任的建立、投行对产业趋势的洞察,依赖隐性知识和人际判断,AI无法编码。简言之,就是搬运信息的岗位在消失,赋予信息意义的岗位在升值。

“AI现在已经完全能够胜任一些传统工作了,可以达到‘1个人+AI>2个人’的效果。”据小志观察,现在的AI写代码水平,比普通实习生强得多,速度也更快。所以对于这类人才,虽然需求很大,但是招聘要求也更高了,因为不再需要承担基础性、流程化的工作。“现在像数据分析、写文本、写代码,这些工作都可以靠AI

快速完成,但也还需要人工审核一下。”

某大型券商内部人士也直言,公司目前开发AI基本是辅助日常工作,对于工作效率而言有明显提效作用。但目前来看,AI还不足以替代人。当前,AI替代的不是“金融人”,而是简单或重复性的任务。

需求之变危中有机

回顾2015年牛市,券商大举招聘的是证券经纪人。如今,AI人才则是券商的招聘重点。十年之间,券商要的已是两类截然不同的人才。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从业人员管理系统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证券行业登记从业人员数量为36.35万人。其中,一般证券业务23.33万人、证券经纪人1.68万人、证券投资顾问9.84万人、证券分析师5907人、保荐代表人8153人、证券评级903人。

随着券商财富管理转型,证券经纪人数近年来呈现逐步下滑趋势,更有个别机构的证券经纪人逐步清零。这是一个时代的落幕,也为AI时代下的券业人才敲响警钟。虽然证券经纪人数量清零的主因是行业转型而非AI替代,但AI在中后台运营、报告撰写等环节承担相当工作量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前述国金证券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也提到,今年校招延续了公司“以业务战略牵引人才布局”的一贯思路。在金融科技与大模型应用、产业研究、机构间REITs等战略业务方向上均有适当的增量布局;标准化、事务型岗位则适当缩量。

“AI时代既创造了需求,又加剧了竞争,但抓住AI机会的券商,在未来的竞争环境下,也会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在这一背景下,对AI专业人才、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更加旺盛,这类人才也更具有竞争力。如果可以协同发展,更好地利用AI技术的人才才会具备更大的竞争力。”郭施亮说道,建议证券行业从业人员树立起危机意识,避开基础岗位,或容易被替代的岗位,提升个人IP影响力、客户资源储备与决策、统筹能力等,这样在AI时代下才不容易被替代。

北京商报记者 李海媛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

中国绿色金融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重要借鉴意义

当前,绿色金融正成为全球金融业关注的焦点,中国绿色金融规模持续扩容、标准体系加速统一,但绿色企业出海仍面临瓶颈,高碳行业转型、碳核算披露、转型金融产品等现实课题持续考验行业。服贸会期间,“2026年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年会”举办。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在年会期间接受了北京商报记者的专访,针对绿色企业出海赋能、中国绿色金融经验的国际借鉴意义以及绿色金融体系“下一程”展开分析。

资金与技术“双赋能”

当绿色企业“走出去”面临资金与技术双重瓶颈,如何破题受到各方关注。马骏在年会举办期间接受北京商报记者专访时,并没有从宏大的数据谈起,而是先讲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

“绿色企业成长很快、规模很大,但面临国内市场竞争趋于激烈的问题。”马骏的语气平静,却直指行业痛点。光伏、风电设备、电动车、电池——这些中国在全球市场占有率领先的产业,在国内的很多项目收益率并不高。一个典型的新能源项目,国内收益率可能只有6%,而同样的项目放到东南亚,收益率可能达到12%。

面对这一机遇,赋能企业“走出去”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继续推动和努力搭建平台,支持中国企业出海,离不开资金和技术赋能。”马骏表示,一是给资金。下一步应更多使用人民币帮助企业出海。若在境外融资,当地

利率可能高达10%;使用人民币融资,资质较好的企业可拿到3%左右的利率。以低成本支持出海,项目成功概率会更大。二是要推动中国绿色技术“走出去”。中国绿色技术已在国内大规模应用,但不少发展中国家,如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对中国绿电、垃圾处理、海水淡化、节水等技术的需求较为迫切。这些技术若与低成本资金相结合,项目可获得更好收益率,风险也会降低。

据了解,9月7日,香港绿色金融协会(HKGFA)连同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GBA-GFA)于中国香港举办了第九届香港绿色金融协会年度论坛暨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年度会议。“绿色加速器”(Green Accelerator)于论坛上正式启动,此新平台总部设于中国香港。

作为加速器筹委会主席,马骏对这个平台的功能如数家珍:“一是帮绿色科技企业找到东南亚、其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较好的应用场景,即需求方;二是从资金角度赋能,加速器的发起单位中有的做股权投资,有的做贷款,有的可提供担保;三是在其他领域缺什么补什么,比如协助绿色企业找订单、土地、原料、专业人才、政策支持等。从而把这些项目组织起来,用技术、需求和其他要素组成可融资项目。”

马骏表示:“这有助于缓解目前绿色金融在海外的一个突出瓶颈:很多金融机构想投资项目,但难以找到合适的真正可融资项目。‘创造’一批可融资的绿色项目,就是‘绿色加速器’的主要目的和功能。该平台已在中国香港启动,未来还会在新加坡、伦敦等地设办公室。”

“早一两步”

如何赋能绿色企业出海,同时也根植于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中国绿色金融的经验,对其他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马骏看来,中国绿色发展,包括绿色金融、绿色科技,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刚走过这条路,其他发展中国家看中国与自己相似,中国经验更具有相关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中国绿色金融规模很大,资金也很便宜,可以大规模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绿色低碳转型。

这种“早一两步”的优势,在数据上体现得尤为直观。马骏常常对发展中国家的同行讲一个数字:中国绿色金融占整个银行体系贷款总量比重已达17%,即整个银行体系贷款中17%已是绿色贷款;很多发展中国家刚起步,这个比例可能是3%、5%。“他们羡慕中国为何能这么快建成如此大的绿色金融体系。”马骏说这话时语气平和,但透着一份底气。

“我们有很多经验可提供,包括标准体系、披露要求、产品设计、激励机制设计等。我们通过CASI(可持续投资能力建设联盟,Capacity-building Alliance of Sustainable Investment)平台传播包括中国在内的绿色金融最佳实践。”马骏表示。

“过去两年半,CASI培训覆盖了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一万多名绿色金融专业人士。CASI线上平台已经上线了80多门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课程。CASI课程已经由四种语言呈现,包括英语、中文、法语和俄语,我们正在开发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课

程。”马骏表示。

另一个中国可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是绿色技术。基于此,马骏认为,中国绿色技术质量较好、成本较低。新能源、电动车、电池,或以垃圾为原材料制成的各种有附加价值产品,成本都相对更低。由于技术竞争优势,这些项目在海外的投资收益率较高。

转型、突破、创新

如果说前两个话题关乎“向外看”,那么马骏谈到的第三个维度,将目光拉回了中国绿色金融体系自身的演进。

过去一年,中国绿色金融稳步发展,目前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的整体存量规模接近50万亿元。202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印发《金融“五篇大文章”总体统计制度(试行)》;同年6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相继出台。这一系列动作,标志着中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迈入统一协同的关键一年。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绿色金融体系目前的搭建程度时,马骏总结道:“绿色金融框架中的要素都在转型、都在突破、都在创新。”

“体系层面,几大支柱都在不断完善和修正。”马骏表示,标准方面,“纯绿”标准已做了至少三个版本。现在正在做转型金融标准,即把十几个高碳行业每个行业应如何转型讲清楚,如钢铁可用废钢炼钢、绿电炼钢或氢冶金等路径。

披露要求的变化同样深刻。马骏回忆,在披露方面,过去披露与污染相关的环境效益,

如是否减少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现在要披露碳,因为碳中和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和领域,也与转型高度相关。因此碳核算成为披露的重要方向。

产品体系的创新则更为具体。马骏提到了“挂钩产品”——与企业碳强度降幅挂钩。马骏表示,产品方面,过去主要是传统的绿金产品,如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现在要发展转型产品,尤其是挂钩产品,与企业碳强度降幅等KPI(关键绩效指标)挂钩。降幅快,就给予低利率,降幅未达标,就提高利率形成约束。他表示,激励机制也在同步转型:过去,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纯绿项目,如新能源项目可获得低成本资金;以后转型也应纳入支持范围,提供低成本资金。

“整个绿色金融体系正式启动是2016年。当年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共7个部委参加,出台绿色金融指导意见。”马骏将思绪拉回到多年以前。那时绿金委刚发起,只有几十家单位,中国绿色金融规模以绿色信贷余额计量只有几万亿元。而今天,绿金委已有330家机构成为成员单位,绿色金融余额发展到50万亿元规模。

“当前新的重点是转型金融。”马骏强调,绿色布局已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下一步的突破口是推动高碳行业向低碳转型。钢铁、水泥、有色、化工、煤电、航空、航运在内的11个高碳行业,转型路径已逐步明晰。“要让这些路径通过金融手段落于企业,推动其向低碳转型。”这句话,既是马骏对绿色金融“下一程”的判断,也是这位绿色金融领军人多年来始终未变的初心。

北京商报记者 胡永新